历史的巨变

——访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教授

记者　梁丽萍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作出的重要论断。这个问题本来已很清楚，似乎已不需再作多少说明。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以至中年人来说，五十年前的事已离得很远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对当年发生的一切已经相当隔膜，缺少完整而真切的了解。学术界也有人对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及其必然结果——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提出了质疑或否定，如认为它中断了极具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坊间流行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又有意无意地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间无非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这会形成一种误导，同历史的本来面貌相去太远。因此，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重温历史并非多余。

金冲及：是的，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民族，都非常珍重自己的历史。历史是一种集体的回忆，包含着丰富的前人的经验，它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见未来。特别是近现代史，它与我们的关系更加直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很多人一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的情景，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不是出于什么怀旧的情绪，而是因为那确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的时刻。现在有些年轻人可能不很理解这一点，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亲身在旧中国那种悲惨境遇中生活过，也许很难理解这场历史大变革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备受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全世界面前挺身站立起来。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恣意宰割中国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多少年来国家四分五裂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不复存在。一向受尽压迫和欺凌的普通人，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命运开始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再听人任意摆布。

新中国诞生了，但是它要想站稳脚跟，依然面对着严峻的考验。三个突出的问题摆在它的面前：第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仍有一百多万军队，盘踞在华南和西南地区，准备顽抗。在各地，还有 200 万武装土匪。第二，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区，人民政府面对着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经济总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猖獗的烂摊子。当人们沉浸在开国的欢乐中时，从 10 月 15 日开始，物价突然大幅度上涨，人心开始浮动。第三，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抱着敌视的态度，实行包围和封锁。苏联对新中国也不完全信任。如果在外交上处理稍有不当，就可能陷于孤立或重新沦为别国的附庸。

这些困难能不能克服，对新生政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本着《共同纲领》规定的各项基本方针，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军事方面的发展是顺利的。到 1950 年 6 月，已完成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第二年，又达成和平解放西

藏的协议。经济方面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解决的难度也更大。经过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1950年 5 月以后，全国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饱受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之苦的老百姓，把它看做远远超出预期的奇迹。在对外关系方面，到 1950 年 10 月底，已有十八个国家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亚洲和北欧、中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致力于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了工矿、交通运输等企业中留存的封建把头制度；取缔妓院；严禁吸毒；有力打击了流氓和黑社会等恶势力。这一切，使人真正感觉到：新旧中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

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满怀豪情地回顾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海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了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 经过这一年，中国的历史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的火焰燃烧到东北边境，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得不在 1950 年 10 月 19 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开始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全副现代化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把他们赶回到三八线，并且把战线稳定下来。1953 年 7 月 27 日，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当时担任侵略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在回忆

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使它成为谁也无法小看的力量，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削弱或拖垮新中国，相反，倒是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人们踊跃参军，捐献飞机大炮,努力生产,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战争。到处热气腾腾,对各方面的工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全国各地还开始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活动,清除了一大批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使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保障。

抗美援朝还推动了土地改革的开展。到 1951 年 8 月底,已在三亿一千余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占应该实行土改地区的 3/4 以上。它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为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当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新中国同时担负起一项极为繁重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为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好准备。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地上疮痍满目，百废待兴。1949 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已跌入最低谷：同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 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 1/4 以上,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粮食减产 21%,棉花减产 46% 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市场萧条，人民购买力低下。

为了恢复经济，人民政府首先抓紧从修筑铁路和兴修水利这两方面下手。铁路方面,先抓修复工作,到 1949 年底,80%的里程已经通车。1951 年,又着手兴修成渝、天兰和从柳州到镇南关三条新的铁路。成渝铁路的修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水利方面，以治理连年泛滥成灾的淮河为重点。1951 年,国家对水利的投资比

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开支最高的一年增加 20 倍。1952 年,为了防止长江水患，开始了荆江分洪工程。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简称五反运动)。

到 1952 年底，经过短短三年的努力，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时超过 77.5% ,比解放前历史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已按原计划胜利完成。在中国开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这些年，陆续发表了不少对于建国初期某一方面问题、教训进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章。此外，我们也曾听到这样一种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历史的概括：经济上照搬苏联模式，政治、文化上犯‘左’的错误,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后来是闭关锁国),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往往都被追溯到建国初。看来，对于这段历史也同样存在着如何全面认识、本质把握的问题。

金冲及：是的。有些历史研究工作者为了尽量少讲或不去重述前人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常常着重强调事件还有它的另外一面，但这对有些不熟悉事情全部情节的读者会留下片面的印象。我们并不否认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也曾犯了许多错误，其中教训必须汲取。但是，以往的历史并不是由无数错误累积而成，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取得巨大成绩并不断修正错误、走向胜利的历史。这里确实有一个如何全面认识历史的问题。

开展大规模的建设，使祖国走向全面的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从 1953 年起,这场建设热气腾腾地在中国大地上全面铺开。这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也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流和本质。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对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谈得太少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方面首先强调发展轻工业。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时,宣布“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这在近年来似乎也引起了争论,认为这是‘照搬苏联模式”。其实，对问题的探讨，必须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进行剖析。那样做的原因，只要看一看当时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形就可以明白。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程度，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已难以想像。它所遗留下来的工业结构是畸形的：轻工业所占比重极大（当时因为原料和市场等条件的限制，甚至连这一点设备的利用率也很低），而重工业的基础却异常薄弱。钢产量在解放前最高的 1943 年只有 923 000吨,在 1949 年只有158 000吨,而且缺少轧钢设备,以致有限的钢产品不能充分利用。煤矿除外国人控制的几个大矿外，大多是临时性的小斜井，寿命短促。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也小得可怜，而且设备陈旧落后，不能制造重型或者比较精密的机器。至于精密工业、国防尖端和工业技术的水平，更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拟。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言，没有巩固的国防可言，更没有现代化可言。

把重工业作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并不意味着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所谓集中主要力量，不是集中一切力量要搞重工业，其他问题都不搞了。他们指出：轻工业是保证人民需要的，同时又便于积累资金，所以对轻工业的相应发展是不能忽视的 不发展农业,粮食就不够吃,所以要经常注意,不能忽视。这种思路显然同苏联有着区别，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刚起步的时候，就能敏锐地注意到这些问题，是不容易的。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中国人来说，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有些方面连常识都没有，但又不能等待，做起来困难自然很多很大。由于既缺乏经验，又缺乏调查资料和必要的统计数字，建设人才也严重不足,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实上是‘边计划,边执行，

边修正”，建设工作也是边摸索边往前闯的。但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仍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些例子：

当时在工业建设中，被看做“重中之重”的是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炼铁厂 7 号高炉三大工程。它们都是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大型现代化工程，到 1953 年 12 月相继竣工并开始生产。

中国第一个大型合金钢生产基地北满钢厂，1956 年 8 月炼出第一炉钢。它的建成，使新中国具备了生产重武器用钢的能力。

新中国第一套六千瓦火力发电机组，是 1955 年 6 月在上海生产并组成的，开创了中国自行制造成套火力发电设备的记录。

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于 1953 年 7 月在长春兴修。1956 年 7 月，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自己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这个厂成为中国汽车的摇篮。

中国过去自己没有制造过飞机，只能做些修理工作。1954 年 7 月，南昌飞机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

一个接一个捷报传来，使中华民族感到扬眉吐气。其他轻工业和农业也取得巨大发展。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4.8%，经济发展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会后，集中全国优秀的科学家共同制定出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我国许多尖端科技项目的集体攻关，就是从这时起步的。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的同时，政治建设（特别是民主政权建设）也跨出了新的步伐。1953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

《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6月，各地基层的普选工作完成，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七八月间，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履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会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新中国大规模建设的开始，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朝鲜停战的实现，使缓和远东和国际的紧张局势有了可能。为了开拓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必须正确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应当怎样相处的问题。 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第二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并且以大国身份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这次会议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证明国际争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国际紧张局势有可能求得继续解决。 1955年4月，中国又应邀参加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国际性会议。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国家中，有二十二个还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不少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疑惧。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耐心说理,尊重对方,博得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会议公报被一致通过。从这时到1959年底,同中国先后建交的有十一个国家，全部都是亚非国家，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

这真是一个凯歌前进的时代！前人的业绩，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基础，是不应该被淡忘的。

记者：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有些同志在现实的改革的触动下,进而对当初党的决策产生了怀疑,发出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有的则把问题提得更加尖锐，认为走社会主义

道路就是一种选择的失误，是“强行把正在孕育的资本主义作了人工流产”。对此，我们应如何认识？

金冲及：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在这一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前进。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新问题，也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明白宣告的奋斗目标，为人们所熟知。它的目的是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地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在向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说明《共同纲领》特点时也专门讲了一段话：“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在建国初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部分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掌握着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但最初在整个比重上并不占有优势。而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公私经济的比重已发生转折性的变化。据 1952 年 8 月的统计，工业总产值中的公私比重已由 1949 年的 43.8%与 56.2%之比，变为 1952 年的 67.3%与 32.7%之比；私营商业在全国商品总值中的经营比重，

已由 1950年的 55.6%降为 1952 年的 37.1%,但在零售方面私营经营在 1952 年仍占全国零售总额的 67%。这是一个有着全局意义的新情况。可以看出,到 1952 年,无论工业或商业中,社会主义成分都已取得优势地位。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这种优势地位还在迅速发展。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实际上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就在作出这个统计的下一个月，毛泽东根据发展着的情况，敏锐地开始提出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在 9 月 24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通常被概括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一化’是指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仍然是主体;‘三改’是指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这条总路线提出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长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这个改造工程,在 1955 年春夏之交以前,步子是比较稳妥的，合作社 80%以上都是增产增收，这和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量大幅度下降有明显的不同。但到 1955 年 7 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等像‘小脚女人’那样,要求‘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手工业的合作化,在 1955 年上半年以前的几年里，总的说来，发展是快的，也是稳步前进的。但随着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速

度也大大加快了，出现了同农业合作化中类似的缺点和偏差。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中国人的一个了不起的创造。但在它的后期，也受到 1955 年夏季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影响，并且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很适当。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从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1953 年底，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出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中国要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早就确定了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转变。过去许多人心目中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大概要停一个时期，到那么一天，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土地国有化，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这叫社会主义革命，就像消灭地主的土地改革那样。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给了人们一个新的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随着一天天增长，同时采取稳妥的步骤对其他经济成分进行改造；这虽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

应该怎样看待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件事？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后期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后，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写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无论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来看，或是从世界范围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在有着几亿人口的中国建立起来，都是一件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反映了历史必然性，使全党和全国的各项工作得以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前进。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离开这个起点，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言。

用形象的比喻来说，一个新生儿出生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临产前有些地方没有处理好，急了一点，粗了一点，以致遗留下一些问题，有教训可以总结，但无论如何，这个新生儿已经来到人间，他的生命已经开始，这是一件首先值得大书特书的喜事。至于他存在的某些先天不足，不可能把他再塞回到娘肚子里过些时间再生出来，只能在后天逐步加以弥补，这是我们需要足够注意去做的事。当然，比喻总难完全贴切，但它的基本道理是明白的。

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这一百年内，从一个备受外国侵略者欺凌侮辱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濒临灭亡边缘的悲惨境地，到奇迹般地重新站立起来，再到今天以举世瞩目的姿态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突然到来的，也不是一两次拼搏和冲击就能实现的。中间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而每次历史性巨变都得来不易，常常走过一段艰苦曲折的历程，付出过代价，给后来者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前人在当年那种历史条件下经过艰难摸索创造的业绩决不能被遗忘，更不能用轻薄的态度去对待。

不要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薛暮桥同志谈社会主义改造

薛小和

新中国成立以前和刚成立的时候，党的领导人认为，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过程，从 1949 年开始，到 1956 年基本完成，只用了七八年时间；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曲折发展并逐步深化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政协讨论时，有些人士提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答复说，“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因此，《共

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的政治基础。”“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它逐一列举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强调“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述规定和方针，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多次反复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它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及其性质，特别指出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他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的观点，他在建国初期发表的其他讲话中，也曾反复阐述过。

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前和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党的领导者充分估计中国经济的落后性，认识到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长时期内应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所发展；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将是一个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过程，还是将来才能实现的事情。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没有照抄苏联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没收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而是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们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战略方针去做的。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党中央决定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之后全面展开的。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在 1952 年提出的。他从 1952 年秋开始酝酿，1953 年 6 月 15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同年 12 月最后正式确定，并载入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而不是原先认为的那样，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然后再采取步骤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认识上当然是一种深化，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再加快前进的步伐，导致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说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要求，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确是事实

农业合作化起初还是比较谨慎的。1953 年 12 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环节，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195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宣告“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批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他以浙江在同年春季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解散 1.5 万个包括 40 万农户的合作社为例，严厉批评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把围绕这个问题的分歧概括为“上马”与“下马”之争，“看来只有一字之差”，“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在这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起来。1955 年秋季以前，农民一般都是参加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此以前还是试办性质。至 1956 年底，加入高级社的农户猛增到农户总数的 87.8%。这就是说，在掀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完成了对一亿多农户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在农民中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但从根本上说，土地毕竟是广大农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土地，他们愿意有一段时间发展小农经济是很自然的。取消封建制度，发展小农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说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要求，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确是事实。后来又匆忙搞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其他因素，导致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多年调整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统一按 5%年利定息。从此，利多利少一样，赚钱赔本一样，吃“大锅饭”现象泛滥全国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同志一直是比较谨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兼任私营企业局的局长，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些盲目乐观。有一次，他在批阅我所起草的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文件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这样匆匆忙忙地去限制他们。他还对我说，要让私营工业发展，发展起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最后还

会变成国家的财产。这是因为陈云同志深知，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而且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单靠国营经济是满足不了人民需要的，必须让私营工商业也恢复起来，并得到一定的发展。他是认真执行公私兼顾、统筹安排方针的。这既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团结了工商业资本家，让他们自愿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当时还鼓励资本家开办新厂，国家还没有多少力量投资于经济建设，所以上海私营工商业的投资比国家投资还多一点。

1952 年以后，陈云同志对公私合营工作首先组织试点，取得经验，再作有计划的扩展。1954 年 1 月，中央对公私合营确定了“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同年 9 月，国务院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有了试点的成功经验，又规范了具体实施办法，很快就有一批私营工厂要求实行合营。由于合营后国家投资改进机械设备，生产率提高，红利一般是增加的，所以资本家乐于接受，有相当一部分对公私合营确实出于自愿。到 1954 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户数有 1700 多户，职工 53 万多人，产值 50 多亿元，占全部私营及公私合营工业产值的 33%.

这时，实行公私合营的主要是大中型企业，剩下来的小型和比较落后的中型企业处境困难，有相当大一部分也要求公私合营。工商业联合会陈叔通主席曾来看我，说“国家把肥肉都吃完了，剩下来一把骨头，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它们扔到垃圾桶中去。”要求全部接受下来，改为公私合营。那时，有许多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还是能够独自经营的，而另一些与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剧烈竞争的企业确实难以生存了。因此，他们愿意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到 1955 年 6 月底，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 1900 多个，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 58%。商业方面，在 32 个大中城市，国营和合作私营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占 52%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